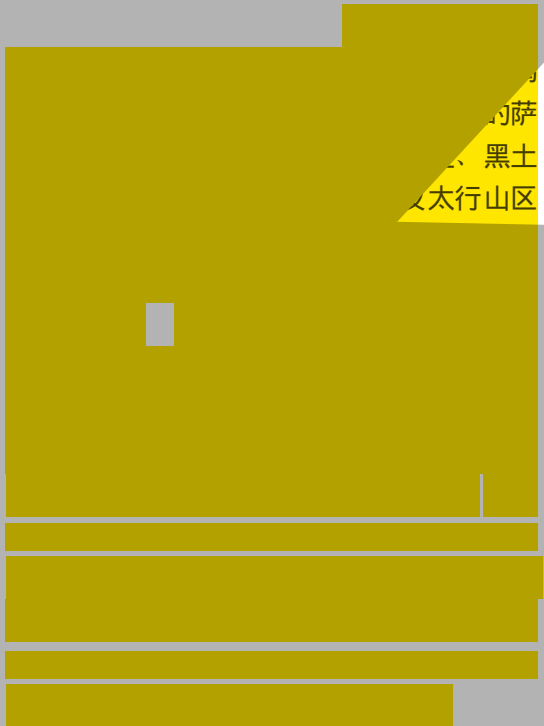


文化比较

北京: 100875)

没有国... 程序, 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主, 但在 Araqçöyü 遗址中仍有少
石器文化... 都没有出现。“莫维斯线”的成因可能相当复杂, 单纯归

... in China ... Europe is Production of small artifacts by non— standardised
... Only Araqçöyü ... include a few technologically progressive elements and



... 的萨
... 黑土
... 太行山区

片, 石器主要以石片为毛坯, 以锤击法直接修理, 刮削器是主要器类, 石制品尺寸主要在 30~50 毫米之间, 重型工具在不同遗址中占有的比重有差异。

二、欧洲地区的小石器文化

在欧洲, 也有一些旧石器遗址的石制品以小石片—刮削器为主要特征, 其主要分布区在东欧地区, 但在西欧也有类似遗存, 代表遗址有法国的 Arago 德国的 ertess ollos 和 il ingsleben 遗址^[4]。

Arago 遗址位于 Tauave 附近, 是一个包含多个文化层的洞穴遗址, 绝对年代距今 32~47 万年, 孢粉分析表明当时气候干冷, 在剖面 17 的 一 层属于遗址的中心部位, 共发现石制品 2 万多件。

制作石器的原料在不同类石制品中的分布不同, 在小石片和断块中脉石英占 92.3, 燧石占 1.6~4.5, 在砾石工具中, 石灰岩占 34.7~61.3, 脉石英占 28.0~46.8, 石英岩占 10.7~18.4, 使用最多的脉石英占 87.5 是断块和碎片, 只有 12.5 是石片。石核数量较少而且多数石核没有经过预制, 但是燧石和石英岩石核显示可能有一定的剥片程序, 而且比普通石核要大一些, 石片台面小, 但由于没有发现相应的石核, 这些石片是否由预制石核生产, 还不能确定。制作石器的毛坯一般在 1~3 厘米之间, 石器类型主要为边刮器占 50.0~53.8, 有凸刃和直刃两种, 第二大类是凹缺刮器和锯齿刃器, 凹缺刮器中仔细修理者要多于克拉克当型, 前者占 26.5~34.3, 后者占 7.6~10.5。最后一类为雕刻器、端刮器和锥钻类占 5.7~11.3, 端刮器和锥钻不太典型, 而端刮器接近奥瑞纳风格。上述器物也可能出现在一个器物上, 如边刮器和凹缺刮器组合形成尖状器包括泰亚克尖状器和根松尖状器, 有时一个边上出现边刮器和凹缺刮器, 有时出现在两个

侧边上等。在砾石工具中有小型砍砸器, 在 E 层集中分布了一些手斧。

ertess ollos 遗址的 和 也同样具有多个文化层, 系法测定它的年龄为距今 35 万年, 最近的测年为距今 22.5 万年, 人类生活时期的气候为一个即将结束的温暖时期。主要选择石灰岩、碧玉和燧石小砾石制作石器, 由于石料原来比较小, 石制品的表面保留了许多砾石皮壳, 从石核和石片的性质来看, 生产石片没有固定的程序, 只有个别石核似乎显示一定的剥片程序, 但数量很少。工具的数量占到石制器 25, 从石料来看, 虽然脉石英数量最多但石器中燧石的数量要多一些。和 Arago 遗址相比小型工具的类型和数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而大型工具的数量要少得多。石器中边刮器的数量超过 50, 凹缺刮器和锯齿刃器的数量占 40 左右, 剩余的器物包括锥钻、端刮器, 另外还有少量的小型砾石砍砸器和一些骨器。

il ingsleben 遗址位于古代的一个河流附近, 人类生存时期的气候特征为间冰期, 遗址的测年数据比较多, 系法测年的数据为 22.8 万年、17.9~30.1 万年、33.5~35 万年, 氨基酸测定年代为 28~35 万年。石制品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为大型砾石工具, 另一类为燧石制作的小型工具。

从石核和石片来看生产石片没有固定的程序, 但是由于石料较好, 完整石片占到 66, 而断块和废片仅占 34, 这和 Arago 遗址形成鲜明对比, 石片角较大在 120~140 之间, 长宽指数较低, 台面较大。虽然如此但加工石器的毛坯中断片和断块仍占到 70, 而完整石片常常不加工, 直接使用。

小型石器的类型包括边刮器、凹缺刮器、锥钻、尖状器等, 这些器型有时候也组合出现在一个器物上形成复合器物。个别器物采用了两面修理方法, 但是很不规律。在重型工具中标准的砍砸器很少, 大多数是具

中西古人类的文化交流造成障碍，东亚古人类有一条完全不同的演化路线。第三种观点认为东亚的生态环境不同，如广泛分布的森林植被使得植物资源和小动物为主要生活来源，客观要求东亚古人类使用一套完全不同的工具套；第四种观点认为人类迁徙过程中可能存在文化断层而使石器制作技术失传^[6]。

上述解释为我们探索“莫维斯线”形成的原因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但是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有些理论很难在考古学上得到证实，比如东亚地区是否存在“竹木文化区”和“人类迁徙过程中可能存在文化断层”这两个假说，在此不作过多评述。本文只根据对华北北部及相关地区小石器文化的研究，对其余四种原因进行讨论，即石料、生态环境、文化交流障碍和制作工具的人。

首先，从小石器文化所使用石料来看，在华北地区脉石英和富含裂纹的燧石是生产石制品的主要原料，这两种石料对石器制作技术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石料对石器大小的影响。但是过分夸大石料的作用可能也不利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我们可以以下面两个遗址的材料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 Araq 遗址，该遗址的石料主要以劣质的脉石英为主，石制品也以小石片—刮削器为主，但是遗址中少数燧石为原料的石制品的加工却明显显示出进步的技术特征，有些石核的显示剥片具有一定的程序，有些刮削器具有奥瑞纳技术风格，还有用石灰岩制作的少量的手斧。

比较 Araq 遗址和华北北部小石器文化各遗址，我们会发现，虽然在华北北部脉石英是使用最多的一种原料，但是质量较好的燧石和石灰岩在各遗址中并不缺乏，在局部地区例如泥河湾盆地东部的板井子遗址中，主要是质量较好的燧石，白云岩和灰岩更是

华北地区广泛分布的一种石料，但华北北部的旧石器文化和 Araq 遗址相比在石器制作技术、石器类型上的差别仍十分明显。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其他遗址中也能找到证据，水洞沟遗址是西方技术传统中最靠东部的一个遗址，其中的勒瓦娄哇技术、石叶技术十分典型，所使用的石料主要为白云岩，而这种石料在泥河湾盆地、金牛山等地也有广泛的分布。

可见，虽然中国北方缺乏像欧洲那样的质量优良的燧石，但是把中西方旧石器文化的差异全部归结为石料可能是不全面的。

其次，青藏高原的隆起是新生代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地质事件，它不仅改变了大气环流和其周边的地理环境，而且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点无需置疑。但是，由于高原隆起过程中其环境效应十分复杂，简单以现在青藏高原的环境效应来解释更新世期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仍有可能出现偏差。从小石器文化的分布来看，中更新世时期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东欧，甚至在手斧文化的腹地——法国也有分布，以石片—刮削器为特征的旧石器文化的分布区明显跨越了喜马拉雅山两侧，如果说中国大陆以砍砸器为特征的旧石器文化和以手斧为特征的旧大陆西侧的旧石器文化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地理上存在障碍，阻碍了两个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那么，中更新世其间中西方小石器文化的相似以及东欧和西欧之间文化上的差异显然不能用地理障碍来解释。

关于东亚地区的生态环境主要为森林环境的结论可能主要基于在华南地区发现的动物化石方面的证据。这样的结论显然不适宜于中国北方地区，也和中国南方地区更新世期间环境状况有一定的出入，大量的孢粉资料以及广泛分布的黄土说明北方地区在整个更新世其间主要是疏林草原和干草原环境，南方地区也存在冰期—间冰期的周期性变化。

上述对几个环境因素的辨析表明,造成中西文化之间差异的原因可能十分复杂,单纯归结为某一种环境因素都有可能出现偏颇。同时也意味着在这些原因背后可能存在更深层次的因素,比如两个地区在人类演化方面是否存在一些差异。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非洲、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地点陆续发现了一批新的直立人化石及与直立人活动有关的其他证据:在直立人生存年代测定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基于这些新的发现,对一些传统的直立人演化理论与模式提出了质疑。比如在格鲁吉亚德马尼斯(Manisi)地点发现了大量的年代距今约175万年的早期人类化石,其特征属于早期直立人或早期人属成员。在中国,位于泥河湾盆地的马圈沟遗址的年代也达到160~170万年,提示人们非洲地区早期人类走出非洲的时间可能大大提前,并进而推测欧亚地区直立人独立演化的可能性。根据对亚洲直立人和非洲直立人的对比研究,学术界出现了直立人是单一种还是多型种的争论,并进而对亚洲直立人是否为现代人的直接祖先提出质疑^[7]。

对中国直立人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认识,大量的发现表明中国古人类是连续进化的,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特征,与其他地区的古人类有所不同:中国的直立人与智人的头骨脑颅的最宽处在中三分之一部分,脸部都比较扁平,比较短;鼻梁比较扁塌,不很隆起;额骨与鼻骨及上观骨相接成水平的弧线,上门齿呈铲形、都有矢状嵴等等。不仅如此,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还存在镶嵌进化的证据^[8]。

虽然上述观点都还处在争论之中,但有

一点应该是明确的即不同地区的古人类的演化历程可能存在一些不同,其进化阶段也可能存在一些不平衡,这些不同点对中西文化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影响。

总之,半个世纪前提出的“莫维斯线”理论,虽然看似简单,但其成因可能相当复杂,涉及人类演化、旧石器制作工艺以及第四纪环境学等方方面面,简单把这种差别归结为人类、石料或环境变化中的任何一种因素都可能是不全面的。

-
- [1] Movius J. 1944. Early Man and Pleistocene Stratigraphy in South and East Asia. Paper of The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and University (30).
- [2] 贾兰坡, 盖培, 尤玉柱. 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1972 (1): 39~58.
- [3] 杜水生. 华北北部小石器文化成因分析, 待刊.
- [4] in Svoboda. Lithic Industries of the Aang. Series of Papers and Publications. Comparison and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28. 92. 219~227.
- [5] Yosef Q. 1995. The Role of Climat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Movement and Culture Transformation in East Asia. In The ES et al eds. Palaeoclimate and Evolution with Emphasis on Human Origins. Wiley. 507~523.
- [6] Schick, K. The Movius line reconsidered. Perspective on the Earlier Palaeolithic of East Asia. In Symposium. A Contribution to the Past. Wiley. Prentice Hall. 569~596.
- [7] 刘武. 直立人研究进展及中国直立人起源与演化的一些问题. 人类学学报, 23. 2004. 增刊, 1~11.
- [8] 吴汝康, 吴新智. 中国古人类遗址.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219~234.

(责任编辑: 方燕明)